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神秘美

[作者] 杨守森

[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在我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追求神秘美的现象。许多作家，在有意识地描写神奇的人物，讲述怪异的故事，展示玄虚的场景。这种神秘美的追求，归根结底，是与人类生存状态中的神秘有关的，同时，也有着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开拓的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这类作品，不仅别具审美风范，且有着激活读者想象，开拓读者思维空间，启悟人们领略宇宙与人生的深奥与复杂，使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价值，人类生存秩序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当代小说，神秘美

许多读者也许早已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悄然涌动起一种对神秘美的追求，尤其表现在莫言、张炜、韩少功、贾平凹、冯骥才、陈忠实、李锐、李贯通、周大新、残雪、马原、格非、刘醒龙、刘震云、阿来、阎连科、徐小斌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那儿。其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文学的与文化的奥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文学研究界是理应给予关注并作出回答的。

一、神秘现象扫描

在中国当代文坛，最初，神秘现象是随着以“寻根文学”为标志的文化反思进入作家们的创作视野的。最早打出“寻根文学”旗帜的韩少功，虽然宣称自己“是无鬼论者”（见《马桥词典》），但在其“寻根”之作中，首先引人瞩目的却恰是鬼气阴森的神秘现象。在被文学界视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爸爸爸》中，那位外貌怪异，只会说含意不明的两句话，永远像个小老头，且能服剧毒而不死的丙崽，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精灵；《鞋癖》中，那位横死之后的父亲，不仅显迹于墙壁，且曾复现于闹市。《马桥词典》中，同样不乏对神秘现象的展示：由于砍掉了古老的枫树，马桥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曾流行过一种被称为“枫癖”的搔痒症；死去的人，埋进墓穴之后，会从嘴里吹出一种叫作“莠玮”的稀贵之物，形如大小不等的包菜，色彩鲜红，耀眼夺目，可理气补血，可滋阴壮阳，可祛风，可保胎，可延寿；马桥人会一种咒语，“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铁铗，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的肿”。所有这些，都给人神秘莫测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出现的其它“寻根”意蕴的作品中，以及相继出现的被称之为“先锋派”、“新写实”、“新体验”、“传统现实主义”等不同风格形态的小说中，这种奇异的审美趋向愈见突出。许多作品，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笔调，极力展示了人类生活的幽深与玄妙，神秘与复杂。

神秘莫测的人物及人物命运：

贾平凹的短篇小说《烟》中，那位曾在祖国南疆前线的山洞里抗击过敌人的现代军人石祥，竟是一个面目俊秀的山大王的灵魂转世。冯骥才在《阴阳八卦》中写了一个“火眼金睛”能“穿墙透壁截裤子看屁股”的万爷。李贯通《天缺一角》中那位有“准半仙”之称的于明诚，其占卜竟出奇的灵验，曾准确无误地预测到了自己40天后的那场大劫；《夜的影》中的右派孙互根，与相爱的人告别时，曾担心自己回不来了，在回来的路上，竟果真因追烧饼袋子而扑入河中淹死了；《庸常岁月》中的德宽舅舅自言自语要淹死在一个水坑里，果然，这个原本水性很好的人，去水坑边上洗手时，竟一头栽进去淹死了。在被视为“先锋派”代

表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中，不少人物都是在莫名其妙中丧生：赵虎死时，家中天天出现大批死老鼠；柳柳死前的恶梦，向她暗示了未来发生的一切。《褐色鸟群》中，我们会看到一位身穿橙红（或棕红色）衣服，前来访晤作家，自称叫“棋”的神秘女子。她来自何处？是否与作家相识？小说结尾再次出现的那位貌似“棋”的女子，究竟是不是“棋”？均不得而知。在残雪《苍老的浮云》中，老况结婚之后，竟惶恐地发现，自己的老婆虚汝华“是一只老鼠。她静悄悄的，总在‘嘎吱嘎吱’地咬啮着什么东西，屋里所有的家具上都留下了她那尖利的牙齿印痕”；《山上的小屋》中，那位父亲，每天夜里会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在被评论界称之为“新写实”的方方的《风景》中，那个埋在窗下的死婴的精灵，几乎无处不在，洞彻幽妙，超越时空，能够了然全部家人的行踪与秘密。徐小斌《羽蛇》（又名《太阳氏族》）中的“羽”，不仅拥有前世记忆，且能通晓未来。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也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精灵。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基本属于传统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主人公之一的那位朱先生，亦能占善卜，独得天机，被白鹿原的乡民们视为活神仙。最后，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化作一匹白鹿，飘然而去。

神秘怪异的事件与情节：

莫言这样设计了他的《生蹼的祖先们》：一天，“我”送女儿去育红班上学，因追赶一只大蝴蝶，不慎误入一片神秘可怕的“红树林”。在“红树林”中，先是遇见了已与外界隔绝3年之久的几位女考察队员，继而遭到一伙人的劫持，被押到了全副武装的皮团长面前。在皮团长这儿，他们竟见到了手脚生蹼，早已死去的爷爷、九老爷以及老姑奶奶们。吴若增这样写了《大鸟》：一位名叫许的青年男子，在月夜海滩偶遇一自称来自海底的神秘大鸟，因倾慕人间，竟化为一纯真娇丽的美女，随男主人公领略了人间风采。周大新在《紫雾》中写道：柳镇西面有一石丘，丘上有一黑洞，洞中有时会喷出一团发光耀眼的紫雾，“喷出紫雾的当晚，镇上肯定要出祸殃，或人伤人亡，或人疯人痴，或见血见泪，或见火见水”。小说中展现的正是伴随着紫雾喷涌而发生的周龙坤被龚老海砍掉脚趾、龚老海的孙女素素跳河自杀等一系列悲剧故事。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写道：金祥在去南山背鳌子时，路遇“黑煞”，回家后竟一病不起死去了。在刘醒龙的《倒挂金钩》中，那位女妖似的大姑出嫁不久，竟果真应验了一位叫化婆儿凶险的预言：先是家中主仆40余人，莫名其妙地一起吊死在门框上，继而大姑爷在与日本人的血战中为国捐躯。那个做了叛徒的小炮子，被砍头之后，居然跪在大姑爷灵前七七四十九天不倒。在李锐的《合坟》中，北京女知青玉香被山洪卷走之后，本已抓住了众人抛过去的绳子，一条丈把长的巨蛇，吐着长长的蛇信子，沿着绳子爬过来，众人吓得抛了绳子，玉香被淹死了；在《二龙戏珠》中，坟地里的那棵老柳树，常在夜间发出一种阴森苍老的“福儿，福儿。”的叫声，小五保终于在这棵树上吊死了。

神秘玄虚的场景与物象：

张炜的《九月寓言》中：牛杆的老婆庆余，曾亲眼看见亡夫牛杆和另一位村人老转儿的鬼魂在村头纠缠不休：牛杆的鬼魂要回家看看，老转儿的鬼魂拦住不让。牛杆儿老婆还亲耳听见了这两个鬼魂的吵闹声。在贾平凹的《废都》中，一开篇，我们便会读到这样的描写：西京城的上空，居然同时出现了4个太阳。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等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这样奇异的场景：在战争期间的高粱地里，人与狗之间曾经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大战。那些狗是那样地神秘莫测，它们有着丝毫不逊于人类的灵性与智慧，它们集结成精明强悍的战斗集体，它们推举出骁勇善战的领袖，向人类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一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白骨的“千人坟”，突然被雷电劈开，腐朽的骨殖被抛洒出几十米远。无数的蝗虫从爆裂的泥土中轰然出世，排列成一条条迸射着幽蓝火花的巨龙。当蝗龙渡河时，河中的鱗鱼们竟用枪口般的嘴巴向它们发动了攻击，展开了一场厮杀。毕淑敏的《预约死亡》，是一部具有很强纪实性的小说（评论界谓之“新体验小说”），其中亦可见这样的场景：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小白和齐大夫，在

一个中秋节的夜晚，竟然亲眼看见一些死者的鬼魂回到医院的院子里欢聚。

有的作家，甚至正是以其突出的神秘色彩，标志了自己创作风格的转向。与早期富有诗情画意的《满月儿》、《小月前本》等作品不同，在贾平凹1987年以后发表的《太白山记》、《白朗》、《烟》、《龙卷风》、《瘰家沟》以及《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等一系列作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正是：增添了浓厚的神秘意味。周大新的“盆地系列”，也是以其神秘色彩，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山东作家李贯通，《洞天》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作品内容的神秘性。

在这股追求神秘美思潮中，当然不排除个别作品的故弄玄虚，但从整体上看，作家们是真诚的、严肃的。那么，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一种神秘思潮的悄然出现，说明了什么呢？不同风格，不同地区的作家，竟表现出了对神秘美的共同追求，这又是偶然的不谋而合吗？

二、神秘美及其特征

神秘，无疑是美的重要源泉之一。

对此，在西方美学史上，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法国作家、美学家夏多勃里昂曾经指出：“除了神秘的事物之外，再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伟大的东西了”[1]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也曾声称：“我发现了美的定义，我的美的定义。那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其中有些茫然、可供猜测的东西。……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2] 夏多勃里昂对神秘美的极端化推崇，或许是偏颇的；而像波德莱尔那样，将神秘视为美的特点之一，则是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思维方式以及文化成规的局限，神秘美，却一直未能进入我们的美学视野。

而实际上，对于文学作品的的神秘美，读者并不陌生。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神秘美，一直是构成文学艺术魅力的要素之一。人类最早的文学作品，便主要是“女娲造人”、“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普罗米修斯”、“诺亚方舟”之类具有原始神秘意味的神话故事。之后，文学史上出现的众多名篇佳作，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离骚》、《搜神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法国的《罗兰之歌》、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传》，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哪一部不闪耀着迷人的神秘色彩？美国学者戴维·利明等人曾在《神话学》一书中声称：“新神话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也早已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指出，人类未来文学的发展，是向神话的回归。我们目前当然尚难断定这类见解的正确与否，而事实却是：20世纪以来，在整个世界文学范围内，确已出现了一股向神话复归的文学潮流。举凡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乔尹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这样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也无不弥漫着神话色彩。

从文学史上来看，具有神秘意味的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神话或神话形态的传说、宗教故事等，如“嫦娥奔月”、“诺亚方舟”之类。二是“假定性”艺术手段的产物，即作家是在借助纯然虚构的神话方式，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评判，其作品往往有着明显的“寓言”或“象征”意味，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卡夫卡的《变形记》等等。中国当代文坛上出现的诸如吴若增的《大鸟》、莫言《生蹊的祖先们》、格非的《褐色鸟群》、方方的《风景》等，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三是神秘现实主义创作视角的产物。在这类作品中，作家往往是将神秘现象视为真实可信的存在予以描写的，如被称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马尔克斯，即曾这样解释自己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神秘现象：“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仔细地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

活大有径庭的事情。”[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大量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类既不同于历史神话，亦非“假定性”手段之产物的神秘现实主义之作。

历史上出现的神话，以及“假定性”手段之作，在富有理性智慧的现代读者看来，似已没有多少神秘性可言。面对这些作品，读者会清醒地意识到：这是神话，是民间传说，是宗教故事，是想象，是幻想，是夸张，是某种创作技巧的产物。如读卡夫卡的《变形记》，谁也不会相信人一夜之间会突然变成甲虫；读方方的《风景》，谁也不会相信会有那么一个无处不在的婴儿的鬼魂。即如这类作品的作者本人，也会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进行“虚构性”的创作。而属神秘现实主义的第三类作品，就大不相同了。

第一，在这类作品中，由于作家是将神秘当作真实来描写的，因此，亦往往会给予读者真假难辨的感觉。如贾平凹在短篇小说《烟》中写道：那位石祥，不仅有着与那位毫无生命联系的山大王同样厉害的烟瘾，且在7岁的时候，曾经凭依神秘的预感，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古堡一角，找到了那位山大王曾经用过的烟斗。这就极易让读者以为，石祥或许竟果真是一位山大王的灵魂转世。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这样写了那位朱先生的神奇之死：一天，朱白氏正和儿媳坐在院子里闲话，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顶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白氏脸色骤变，立刻想到了丈夫朱先生，急忙叫孩子去前院里探望，结果发现，刚才还在让妻子给他理发的朱先生，已经坐在藤椅上死去了。在作者笔下，由于白鹿飞过是朱白氏亲眼所见，自然亦增加了这一神秘现象的可信性。另如莫言笔下雷电劈开的坟墓，张炜的《九月寓言》中那两个在村头纠缠不休的鬼魂，毕淑敏《预约死亡》中不只一个人亲眼看见的鬼魂欢聚，刘醒龙笔下那砍头之后居然跪在大姑爷灵前七七四十九天不倒的小炮子的尸体等，亦均给人以历历在目的真实感。

第二，历史上出现的神话，在幻想、夸张与向往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种对天地鬼神、山妖水怪之类神秘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恐惧感，弥漫着一种人性压抑的盲目崇拜情绪。而在我国当代的神秘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会感到，作家们表现出来的，决不是向上帝和神魔鬼怪的臣服，更不是向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的倒退；亦非传统意义的夸张与幻想，更与理想与愿望无涉。而是以一种清醒的现代理性意识，以超然潇洒的心态，力图揭示由于人类玄秘莫测的心理、感觉，或其它尚不清楚的自然力量等等所导致的怪异现象，以求再现人类复杂的本原状态的生活，对宇宙人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把握。因此，当我们面对即如毕淑敏《预约死亡》中的鬼魂相聚，张炜《九月寓言》中的金祥路遇“黑煞”之类场面时，并无恐惧压抑之感。在《白鹿原》中，那位朱先生白日升天的情景，甚至给人以欢乐明快的诗意享受。

本文所说的神秘美，主要是就这类既非神话，亦非“假定性”手段之产物，用传统理性的思维方式，用既有的美学、文学理论，难以解释神秘现实主义之作体现出的审美特征而言的。这是一种别具现代意味，值得深思的神秘美。

三、宇宙智慧与文学幽妙

神秘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当然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关。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批中国作家，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陈忠实、余华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出《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但这影响，只能说是一种诱因，而从根本上分析，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寻求自身开拓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的文学创作，曾长期独尊现实主义原则，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客观现实生活出发，要求文学作品必须有明确的主题思想，以实现其“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李泽厚曾经不无道理地指出，这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极端尊崇理性的古典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窒息了作家的想象力、创造力，致使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而要打破这种局面，迫切需要的是，作家思维方式的调整，文化视野的开放，正如贾平凹当时曾经指出的：“中国作家面临着心理支点和哲学基准的转移问题，要写出诺贝尔文学奖水

平之上的作品，我认为这是重要条件之一。”^{<4>}另有许多作家，则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必须挣脱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束缚，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信条，要以复杂的眼光面对生活与人生。早在1985年，莫言即曾发出了这样的呼声：“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所以，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主题的。”^[5]张炜也曾这样讲过：“生活中的确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过去我们的文学中写了许多的经过过滤的东西，只要是违背了一种普及了的‘哲学’，就一概不能写，如实记录也不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读者弄简单了，他们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书本出发评论生活，转而又依据书本评论书本。这多可怕。”

^[6]阎连科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文学才有发展。”^[7]

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作品中神秘现实主义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中国当代作家刻意冲破原来文学束缚的产物，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作家在心理支点及哲学基准方面发生的某种转移，即作家们不再固守由存在到意识这样一种单向度的心理模式，不再凭依一般的哲学常识，简单化地面对世界与人生，而是以更为自由的心态，以开放的视野，力图通过对生活本原中古怪离奇，鲜活粗砺之神秘现象的描写，真诚地揭示人类生存状态中的奥妙，表现人生和世界的多变与复杂。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神秘现实主义思潮，或许可以视为是更高层次的向现实的回归。这种回归，对于改变中国文学意蕴的肤浅化，生活内容的表面化，对于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在这类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相关作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主客分离的理性文化不同，中国古老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类的传统文化，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但从哲学意义与现代科学意义上来看，应当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宇宙智慧。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深入研究了中国人的阴阳、易理、灵魂之类观念之后指出的，中国人不仅在道德方面达到了最完满的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莱布尼茨正是受中国易学的启发，创建了二进制算术原理，为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共鸣，这位伟大学者甚至曾经动感情地斥责过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恭之论：“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8]而与以主客分离为特征的西方理性文化相比，中国人的宇宙智慧中，本身就包含着浓重的神秘意味。与之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成分，是明显多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神秘色彩，也远较西方文学突出。早在六朝时期，就已出现了以神秘内容为主的“志怪小说”，在后世出现的即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类基本上属于写实性的作品中，也常常可见不可思议的神秘内容。也许正是得力于我们民族传统中独特的文化基因，得力于古老的宇宙智慧与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同时当然也是得力于思想开放的时代背景，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神秘视角才日渐受到了重视。以当今的全球化视野来看，在我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这样一种重视神秘现象的视角，自然会更有利于揭示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格结构，更有利于发现与开掘民族精神的密码，从而创作出更富于民族个性的作品。

就生活现象或自然现象而言，难以言说的神秘，虽然令人不安，甚至使人恐惧，但又充满着美的诱惑。因为一切都一清二楚了，都一目了然了，神秘不存在了，生活也就索然无味了，生活中的美，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同理，在文学作品中，神秘，才耐人琢磨，才诱人想象，才益生“美”。美的境界，便往往正是遐思不尽、想象无穷的境界。从文学史上来看，许多成功之作，神秘，便正是构成其复杂审美意味的要素之一。《红楼梦》中，那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空道人”，那储存着金陵十二钗命运档案的“太虚幻境”，以及宝玉与黛玉之间的

前世姻缘，以今人粗浅的理性目光来看，均具浓烈的封建迷信色彩，但正是这神秘，使《红楼梦》平添了多少令人回肠荡气、遐思不尽的艺术魅力。可以想见，如果从中剔除了这些成分，《红楼梦》将会变得怎样的干瘪与苍白。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祥林嫂，通常只是被看作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实际上，其悲剧意味要复杂得多。试想，假若祥林嫂的原夫没有亡故，假若她的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没有死于伤寒，假若她和贺老六的儿子阿毛没有被狼吃掉，祥林嫂会有这样层层加剧的悲剧人生吗？无疑，病灾狼患，是导致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怕是很难和封建礼教沾上边儿的，实在如作品中的卫老婆子所说，“叫作‘天有不测风云’”，或许人们通常所说的“命运”。而这与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相关的“不测”之“命运”，往往是任何一个人也难以抵御的。因此，鲁迅《祝福》中的悲剧美，实在是含有一定程度的“神秘美”成分的。这篇小说的真正伟大之处也许正是在于，通过展现与社会环境、与病灾狼患相关的祥林嫂的独特命运，写出了超时代、超阶级的人的玄妙莫测的生存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那些富有神秘意味的作品，显示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本身的玄妙与幽深。读着这样的作品，尽管会使我们得以茫然无绪的困惑，乃至原有思维逻辑、文化积淀被撞击的阵痛，但同时也会强有力地激活我们的想象，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让我们深切地感到宇宙与人生的博大与深奥，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四、科学返魅与尊重神秘

神秘，常常成为科学之母。

神秘现象中，往往包含着永恒的智力诱惑。

只有尊重神秘，研究神秘，才更有利于科学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对此，一些目光深邃的科学家、思想家早已深有感触。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我把科学和神秘主义看成是人类精神的互补体现，一种是理性的能力，一种是直觉的能力。它们是不同的，又是互补的。……两者都是需要的，并且只有相互补充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9] 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早就指出：“确实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们是自身显示出来。它们是神秘的东西。……哲学家既站在无法表达的东西的边缘从而保持沉默，事情本可以到此为止，无奈在神秘的领域之内存在着若干对在世界上的状况有直接关系的迫切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完全超越于世界之外。”[10]

文学作品中的神秘美，从根本上说，是与人类生命状态与生存环境中的神秘有关的。人类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但人类的生命现象本身以及人的生存环境中，至今仍存在着许多难解之谜。如预感的应验、心灵的感应、生的偶然、死的无奈，以及动、植物的异常表现，北欧的巨阵石圈，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象，5亿年前的人类足迹（发现于美国羚羊喷泉），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发现于加蓬共和国的奥克洛铀矿），来历不明的空中飞行物等等。对于这类现象或疑案，人们虽大多承认其存在，或不乏切身的感知与体验，却一直不能用理性知识予以完满的解释与说明，于是，在许多情况下，便不得不用似是而非的诸如“无限”、“巧合”、“偶然”、“幻觉”之类字眼予以敷衍。细细想来，这类字眼，常常不过是人类无力把握神秘，心虚气短，却又不愿承认自身无能的推诿说词。在这些“说词”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类无奈而又沉重的心灵痛苦。

仅以宇宙时空来看，随着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的发展，人类虽然对其有了更高程度的科学认识，但同时，也越加感到了宇宙的神奇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比如，天文学告诉我们，银河系里大约有几百亿颗恒星，人类要到达距地球最近的邻居天狼星，即使用光速飞行，也需要10年。而银河系，尚不过是宇宙空间中的无数星系之一。如此浩邈博大的宇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所体味到的：“我既无法想象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是有限的，那它外面是什么呢？），又无法想象它是无限的。”“我为之感到苦恼。”[11]

另如人体自身，在大脑活动机制，体能的范围与程度等方面，也仍存在许多不可理喻的奥妙。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提出假设，认为一个正常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百分之十。另一位心理学家奥托甚至认为，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不过只占他全部能力的百分之四。而人体究竟存在多少潜能，尚不得而知。而人类在体能及智能方面时常可见的一些超出一般理解能力的神秘现象，或许正是人的某种潜能的显示。

实际上，正是由于宇宙时空的渺不可测，由于事物的千变万化，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神秘，几乎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本原性状态的一个侧面。对此，老老实实地承认它，正视它，进一步予以研究，显然要比简单否定或视而不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目前困惑着我们的许多神秘现象中，也许包含着宇宙衍化的更为高超的智慧，也许正孕育着人类理性的现代提升。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更为高级的人类新纪元的前夜，拒绝了神秘，很可能等于拒绝了人类迈进新纪元的入场券。但，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宗教神学的日趋破产，由于现代理性哲学的日渐强盛，对于宇宙万物及人体自身，人类曾一度表现出过分的乐观和自信，以为一切都是那样简单明晰了，清澈透底了，神秘现象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重视了。在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反封建运动的深入，随着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对于神秘现象，更是采取了简单轻率的态度。或者予以牵强附会地生硬解释；或者干脆置若罔闻，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或者将其斥之为封建迷信了事。现在看来，这未免显得目光短浅，甚至武断骄横了些。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随着至高无上的理性受到怀疑的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现，尚难用理性解释的神秘现象，终于越来越受到了文化界及科学界的重视。根据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普里格林（或译“普里高津”）等人的看法：“特别是在宇宙学家中，神秘论又重新受到崇尚。即便是某些物理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也认为，在灵学和量子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12] 1980年，英国物理学家D. Bohm在《整体性与隐秩序》一书中，即曾提出了新的宇宙时空观，认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四维时空，不是真实描述物质的好办法，还有更深刻的东西，这就是隐秩序，在隐秩序里面，所有的物质都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可以超光速的传递。[13] 在物理学领域，量子力学的有关成果，也已对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如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则由集体无意识入手，通过对大量神秘现象的研究，认为宇宙间除了因果律之外，还存在着“同步论”、“目的论”等其它秩序。此外，在以大卫·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儿，甚至已将科学的返魅，视为重构人类理性秩序的重要途径。

普里高津所提及的“灵学”，又被称之为“超心理学”，其研究对象正是原来为科学界所忽视的自然界中物质信息流及影响流的形式。据有关资料可知，早1957年，美国已成立了以“信息传感”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国际超心理协会”；在前社会主义的苏联，亦成立过20多个政府主办的专门研究心感应现象的机构；1979年，法国巴黎索邦学院生物学教授米·乔温博士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超心理学：非理性向科学的回归》（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译本）；1986年，英国生物学家莱尔·沃森亦出版了主旨相近的《超自然现象：一部新的自然史》一书（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译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现代心理学家斯坦利·克里普纳的评价是：“描绘超心理现象特征的相互联系的模式在帮助人们解决某些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都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可以提供线索、模式、隐喻甚至实施方法。”[14]

上述有关研究、见解与论述，无疑显示了人类科学视野的开拓。其中的许多看法，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但就问题本身而言，的确是人类不该回避的。戴维·利明所说的“新神话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弗莱所说文学向神话的回归，亦或许正是与这样的文化背景是相关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装神弄鬼，宣扬封建迷信，乃至借以欺诈行骗的丑恶行径确也大

有人在，对其予以严厉批判乃至打击是十分必要的。但若缘其“泥沙俱下”，便全然否认研究神秘现象的意义，简单将其一概判定为“伪科学”，同样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应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宇宙是无限的，世界是复杂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们至今恐还无法确信：人类已有的经验、思维方式、逻辑规则，已足可以解释一切。有许多事情，实在是无法轻而易举就能判定真伪的。否则，人类历史上，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科学当然是与迷信对立的，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但科学有时候也可能与真理擦肩而过。这是因为：传统科学习惯于以因果思维解释世界，而实际上，因果思维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切。比如牛顿的传统物理学理论认为：如果有可能知道宇宙中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末就能完全精确地预言这些粒子的未来，从而预测宇宙的未来。德国现代物理学家海森堡已经判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决不可能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英国当代生物学家莱尔·沃森也正是据此指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扫除了陈旧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表明对实在的常识性理解乃是严重的误解，为我们感官所感知的具体物质世界分解成了幽灵似的能量模式；心灵与场和粒子交织成某种荒谬的与常规经验不相应的形式。”“按照旧物理学，宇宙是有因果的，一事物在逻辑上导致另一事物。测不准原理一举摧毁了关于事物联系的常识性误解，而且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从物理实在的确定性到统计概率。”沃森进一步断言：“物理学并不能解释神秘的事物。相反，将神秘的事物放在物理学的基础上乃是物理学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沃森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一直在严肃地从事超心理学现象的研究，并也同时因此而受到了“伪科学”、缺乏“可重复性”之类的责难。对此，沃森的反驳是：其实，“医学家和气象学家往往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某些其它学科如地质学几乎完全是观察性和预言性的，但它们之中并无也根本没有任何可重复的东西。”[15]与武断地否定神秘的态度相比，像沃森那样一种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思考，像大卫·格里芬等人那样对科学返魅的重视，或许才是更富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态度，才更加体现出对人类负责的精神。

由此可进一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神秘美的涌现，决不是偶然的。这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正在应合着世界文化的脉搏，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在大胆地汲取着来自世界的、民族传统的等多方面的文化营养，对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思维惯性，悄然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这种应合与吸取，有时也许还是不自觉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已显示了中国作家更高层次的自我理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仅会有助于丰富我们文学作品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会有效地动摇某些一直被我们视为强硬真理的哲学观念，促进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变革，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有能力去迎接未来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伍蠡甫主编《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7 页。
- [2]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序。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 [3] 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46—48 页。
- [4] 孙见喜：《鬼才贾平凹》，北岳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2 页。
- [5] 徐怀中等《有追求才有特色》，《中国作家》1985 年第期。
- [6] 张炜《九月寓言》附录：《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 [7] 杜悦 张清侠：《关注穷苦人书写“疼痛”——作家阎连科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4 年 6 月 24 日。
- [8] 何兆武 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5、133 页。

- [9] 夏军：《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219 页。
- [10] 《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1 页。
- [11] 《波普尔思想自述》，胡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 页。
- [12] [14]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2 页，第 174 页。
- [13]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 页。
- [15] 莱尔·沃森《超自然现象》，王淼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7、268、264、263、235 页。